西方社会

编者按：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质是法治政治，法治是世界各国走向富强的必经道路。在过去的近400年里，伴随一个个大国崛起，法治之花逐渐开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学习、借鉴国外在法治建设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推进法治建设。从本期起，本报将推出关于国外法治建设经验的系列文章，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法治的英国经验

□王雅琴

众所周知，英国法是普通法系的主要代表，令英国这个不列颠小小岛国举世瞩目的是它悠久的、影响深远的法治文明，英国正是以现代法治文明发源地的身份屹立于世界。

基本的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是随着法律的发展，不断演化形成。英国的法治观念代表了英国人对法治的基本理解，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法治的发展。同时，这些法治观念还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

第一，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普通法最核心的精神。庞德曾指出：以历史角度考察，这一基本理念早已蕴含于日耳曼法；以哲学角度考查，这一原则起源于统治者们应依规范而不是专断、应依理性而不是主观臆断来实施统治行为的理论。在英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早已渗透着法是神圣的习惯、法是神圣的传统的观念，因为法是被宣示出来而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习惯法先于国家、国王而产生，所以国王（权力）在法律之下。在以后的针对王权的斗争中，法律至上的观念得以确立和巩固。在英国，法律至上也是议会主权这一宪法原则的体现。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代表了英国人基本的法律理念和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

第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即法律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法律上，公民有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并有权通过控诉制度请求法院排除现实的侵害，即所有人都享有司法上的平等。平等对待自然也指法律平等地对待公民和政府，即使是政府，也不得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正因为把大陆法系的行政法误解为保护了行政机关的特权，从而导致英国人长期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英国人对平等的珍视可见一斑。

第三，程序正义。指程序的正义或正当的程序。在英国，法律程序具有特殊地位，救济先于权利的程序中心主义使得程序比结果更加重要。这就导致了在英国，程序法始终处于法律的中心，绝对地超越了实体法的地位。

法律体系和制度的特色

英国法的特点既典型地代表了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特点，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择其要者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经验和实际应用。英国人信奉法的生命在于经验。相比于法律的终极追求，英国法更重视应用具体程序和规则解决当事人的纠纷。

第二，救济型法律体系。英国法注重事后救济，只有程序的路径才能获得救济，而法律的实体内容在进入程序后才能具体地确定。即英国法不是预先以实体规则界定人们的权利义务，而是规定如何通过程序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或提供有效救济。

第三，不成文宪法。如果说，英国人强调法的生命在于经验，那么英国宪法的发展本身就是经验的结晶。不成文的特征，使得其宪法更加易于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需要。

第四，司法独立和法官造法。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法案》，宣布国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实施，取消了国王用以干涉司法独立的法律豁免权和中止权。1701年议会颁布《王位继承法》，规定法官只要品行端正便可终生任职、法官薪俸从公共财政支付。法官独立的确立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诞生。1854年，议会又通过立法规定了遵循先例的原则，从此，英国的法律制度不断由法官通过判例进行发展，法律创制权使得法官具有了独特的法律地位。

第五，对抗式诉讼。在英国颇具特色的对抗式诉讼中，原告和被告是诉讼活动的中心，法官并不主动询问当事人，只起居间裁决的作用，由双方当事人积极陈述事实、交叉询问和进行法庭辩论，律师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因而在英国律师的社会地位也就很高。

法治转型和发展的路径

勒内·达维德曾说，英国法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具有可用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这句话经典地指出了英国法治发展的漫长、复杂的渐进变革模式。世界历史上，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法治的要求，英国法开始逐渐变革，开启了法治现代化的转型进程。

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首先进行改革的是法院体系和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地方法院体系、创建高等法院体系、设立由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组成的最高法院。1875年实施的《司法法》规定，把旧有的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两个系统合并，法院可以同时适用普通法和衡平法，并确定了衡平法优先的原则。1854年颁布的《国会法》肯定了判例的作用，确立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英国还通过一系列立法简化了诉讼程序。其次，英国出台了大量满足当时社会需要的制定法，以弥补判例法的不足，强化了社会立法。再次，结合新法律的出台，进行了以议会选举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运动，促进了现代民主代议制的形成，也使得议会下院取得主导地位，并可以控制立法权，推动了议会立法的发展。最后，通过改革政府，建立了现代政府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也建立了行政法制。20世纪以来，英国不断地进行立法调整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问题，法治现代化也随之得以进一步发展。一是选举制度进一步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已经基本确立了普遍、平等、公正的选举制度。二是制定和施行了贸易保护制度。三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立法，建立了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四是国有化法的颁行促进了经济法的发展。加入欧共体后，英国的法律随之进行了调整，以维护主权，保护本国利益。

综上，英国法治现代化的模式是经验主义的法治现代化模式，英国人走过的是一条渐进改良的内生型法治发展道路。英国法治的演变、发展是尊重传统的经验理性化过程，也是代表人类智识上共性的合理性法治资源借鉴的过程。

国际力量在北极的激烈争夺

□白秀兰

随着北极变暖，导致北极地区岛屿面积增大，北极航道逐步开通，其潜藏的战略价值凸显，随之而来产生许多争议问题：北极近海大陆架的主权归属、航道管理权、军事制高点争夺以及资源开发利用、话语权等等，引发各种国际力量关注和激烈争夺。在竞争中形成“北极五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和“北极八国”（“北极五国”加上芬兰、瑞典和冰岛）以及“近北极国家”（欧洲的英国、爱尔兰、德国、荷兰等国，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此外，国家集团（欧盟、北约）也参与其中。

争夺北极领土主权。北极领土之争始于20世纪初。1907年，加拿大参议员帕斯尤可·普瓦里耶首次提出“扇形理论”：位于两条国界线之间直至北极点的一切土地应当属于邻接这些土地的国家。以此作为加拿大对所有北极岛屿拥有主权的理论依据，率先提出对北极的领土要求；北极其他国家相继加入，都宣称对临近北极地区领土拥有主权，从此开始北极领土之争。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北极变暖加速，北极航道逐步开通，北极争端问题再次凸显。

俄罗斯赞同“扇形理论”，认为北冰洋大部分领土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地理延伸，北极是俄罗斯的北极。2007年8月2日，俄罗斯科考队员在北极点的北冰洋底插上金属国旗，宣示对北极海床享有主权，引发新一轮的北极争夺。

美国十分重视“北极海洋国土”主权。2013年5月10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概要中宣称：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和根本的利益。美国在该地区谋求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保护环境，负责任地管理资源，照顾到原住民社区，支持科学研究，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

丹麦与加拿大就西北航道东部入口处的汉斯岛主权归属问题持续争执20多年。丹麦欲以格陵兰岛为依据，划定北极海床势力范围，挣得北极一席之地。丹麦科考人员在北极大量收集地质数据，研究罗蒙诺索夫海岭也就是北冰洋主要海底地貌，试图找出罗蒙诺索夫海岭在地理上与丹麦的格陵兰岛相连的证据，以此证明北极属于丹麦。俄罗斯则认为罗蒙诺索夫海岭是俄罗斯北部地区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英国借助位于苏格兰海岸线200英里远的一个无人居住、附近地区蕴含丰富油气资源的罗卡尔岛，声称对北极附近大西洋水域水下大陆架拥有主权，与丹麦、冰岛产生分歧。挪威收集北冰洋海底数据后，于2006年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对北冰洋大部分海域的领土要求，目前这个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瑞典继俄罗斯插旗之后，宣布将把一艘强动力破冰船开到北极点进行长期“科考”。

争夺北极航道归属权和管辖权。随着北极变暖，北极无主水域逐步通航，形成三条航线，分别是西北航道、东北航道和北极点航线。北极国家就北极航道归属权和管理权产生分歧。

在西北航道归属问题上，加拿大政府坚持宣称西北航道水域是加拿大的“内海”，对这条航线拥有“执法权”，增加在北冰洋沿岸的军事力量，加强实施对西北航道的有效管理，对经过西北航道海域的各国船只做必要的限制，以便减少安全隐患、避免泄漏事故。美国则坚持主张该水域属于公海，是“中立水域”。

东北航道经过的水域大部分在俄罗斯的经济专属区内，俄罗斯人称其为北方海航道或北方航道。苏联时期，用北方海航道概念，强调这个航线在苏联境内的北冰洋水域，暗示苏联对其享有主权或管辖权。俄罗斯承袭了苏联的主张，继续主张北方海航道位于俄罗斯领海或毗邻俄罗斯北方沿海经济专属区内，并宣布“开放”北方海航道；同时，通过法律要求使用北方海航道的外国船只必须经过俄罗斯允许、付出高额的破冰导航服务费才可通行。美国、挪威、丹麦等国家认为东北航道是国际水域，适用于过境航行。有专家预言，东北航道一旦开通，将改变世界贸易结构，进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形成以欧洲、北美、俄罗斯为主体的超强环北冰洋经济圈。因此，控制东北航道，就等于控制世界未来的经济走廊。

穿越北极点航线。从白令海峡出发，穿过北冰洋中心区域到达格陵兰海、挪威海。由于北冰洋中心区域被长年海冰覆盖，海冰层十分厚重，这条航线需要等到北极冰雪全部融化掉才可能开通。

争夺军事战略制高点。早在二战时期，北极航道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北极航道加以控制。加拿大把西北航道视为其内水，是预防苏联军事力量进入北美洲的缓冲地带；苏联在二战后将北方航道视作重要战略防御前沿，防止外国船舶涉足。

北极地区及北冰洋水下成为东西方军事对峙的场所。双方在北极都建立完整的军事设施，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阿拉斯加、格陵兰岛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联合加拿大组建北美防空司令部；苏联在摩尔曼斯克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海空基地。

同时，美苏两国都曾在北冰洋地区部署战略进攻武器。美国以北约组织的名义，在阿拉斯加到冰岛的北极地区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大规模远程相控阵雷达、战略核潜艇、弹道导弹和截击机，联合加拿大成立了“北美空间防御司令部”。苏联将“台风”级导弹核潜艇常驻北冰洋深海巡航，实施核战略威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苏竞相在北极地区部署洲际弹道导弹。到80年代以后，北极的水下制海权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核动力潜水艇成为双方在北极战略对峙的特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美苏在北极对峙局面有所缓和。

冷战后，美、俄都在北极冰下进行潜射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俄罗斯借助地理优势，从俄本土基地飞越北极点对美国实施打击，潜射弹道导弹只需10分钟就可打击美国腹地军事目标，对美国直接构成军事威慑。2004年末，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麦格拉斯堡空军基地建成第一个陆基“战区高空拦截弹”发射基地，部署24枚高空反弹道导弹。2009年，美军在北极地区进行代号为“冰区训练-2009”军演，目的是维持美军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力。同年，“弗吉尼亚”级“德克萨斯”号潜艇进入北冰洋核心地区，受到俄罗斯的密切跟踪监视。

美国通过实施“打入北冰洋计划”，加强在北极的反潜作战能力。2009年，美国政府在“北极地区政策”中提出美国在北极地区有“广泛的、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因而必须有独立行动的能力。为此，在北极地区建立港口和军事基地，配备新型破冰船。2011年夏，美国两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在北极地区举行军演。据国防科技信息网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加快研究制定技术方案，为舰队执行北极任务做准备。俄罗斯则准备在2015年完成组建第一支北极地区摩托化步兵旅。俄海军负责人表示，为提升海军在北极地区的作战能力，将增加新舰只和新驻点。俄国防部明确提出2014年的任务中包含建立国家防御指挥中心和北极基础设施。

争夺在北极问题上的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北极变暖引发世界各国加紧北极科考，为在北极问题的国际立法方面争得话语权，“北极国家”都在加紧“科考”，纷纷制定本国的北极战略，旨在强化本国是北极国家的意识。“近北极国家”、欧盟、北约也根据各自战略目的相继介入北极事物中。此外，印度也想在北极矿藏资源方面“分一杯羹”，澳大利亚对俄罗斯2007年8月10日的北极海底插旗行动做出强烈反应。北极的权益之争正在加剧并有全球化的趋势。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专门关于北极问题的法律条约产生，北极国家只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处理北极地区的大陆架、公海利用以及资源开发等相关事物。

环球瞭望

战略视角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与现实基础

□刘建飞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理念，蕴含着战略思维的创新。深刻认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基础，有助于凝聚共识，增强动力，顺利推进构建进程。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大国关系分两种：一种是普通大国之间或普通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比如现在的中俄关系、中印关系、美俄关系；另一种是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这里指中美关系。与之相应，新型大国关系也有两种，其内涵、基础和建构方略是不同的。

根据“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内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指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而是特定地指向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指向普通大国关系，那么上述三条内涵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有些大国关系（比如中俄关系）已经具备。2013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访俄时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基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呼吁“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表明，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看来，两国已经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他们是在呼吁其他大国也积极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贡献。

当然，两种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着共性，无论哪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都应当是基本要求。现在仍然存在着的同盟关系，虽然符合“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要求，但是却缺失“相互尊重”。而且，同盟关系是旧时代的产物，也是旧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形态，它往往意味着同盟者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这容易滋生“对抗思维”，是与时代潮流相背的，也不利于盟内国家同盟外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

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目前的中美关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关系”，尽管存在着一些“新型关系”的要素，比如两国间保持着很密切的合作，自建交以来一直没有出现全面的对抗。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理念。提出这个理念的意图就是要解决如何破解“大国政治悲剧”或“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必然走向对抗，这似乎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铁律。作为唯一例外的英美关系，也是得益于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那时，英美之间也充满着激烈的战略竞争，有走向对抗的风险。如果没有德国崛起的因素，很难说英美不会走向冲突。

对中国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在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略博弈中，霸权国往往掌控着更多的战略资源，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如果真的发生“大国政治悲剧”，霸权国在两败俱伤的结局中会伤得轻一些，或者伤得不那么致命。中国要顺利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避开、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最佳路径。当然，中美不重演“大国政治悲剧”，对美国也是好事，对世界更是幸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果成功，将开创大国关系的历史。

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新理念并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而是有着相当厚实的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现存的中美关系。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两国不仅没有全面冲突、对抗，而且还在诸多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共赢。可以将现存的中美关系看成是“准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准新型大国关系”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化而来，而不是横空出世。

“准新型大国关系”形成并得以发展的背景有两个：一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相互借重促进本国发展上，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越了相互之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方面的矛盾；二是在全球化、多极化和非极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使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被相对弱化。在上述两个背景同时也是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在竞争中合作是基本形态。一方面，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没有消除，大国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9·11”后形成了两个竞赛场：一是所有大国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二是大国之间争夺战略、经济、政治等方面利益的竞争仍然相当激烈，不过却伴随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其二，综合国力较量是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以及核武器、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国之间竞争已主要不是靠军事手段，不再是攻城略地，用武力抢夺财富。竞争的主要方式转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有限。

“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回归旧型大国关系，还是向新型大国关系演进？答案应当是后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客观现实使然。上述推动“准新型大国关系”形成的因素，同样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然而，毕竟“准新型关系”还是存在逆转回旧型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同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关系还是有质的不同。就中美关系来说，自苏联解体后，两国之间就一直交织着竞争与合作。随着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性质，竞争一面明显在上升。如果竞争一面明显压倒合作一面，那么双边关系就有可能走向对抗。

“新型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以竞争为主的传统模式，转为以合作为主。而要确保以合作为主，双方要从理念、战略上明确“不冲突不对抗”。同时，为了能保证合作共赢和不对抗不冲突，双方应当努力实现相互尊重。在“新型大国关系”三项内涵中，合作共赢是内核，其他是前提和保障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过去中国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只是“多强”中的普通一员，中美关系还不具备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滑向“大国政治悲剧”的现实性并不突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在“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以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关系为着眼点，使中美关系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看出，几十年来，两国未走向全面对抗、冲突，也有合作共赢。然而，两国之间却摩擦不断，在个别领域的对抗、冲突时常发生，战略互信也严重缺失，从而让人总是担忧“准新型大国关系”会滑向旧型大国关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并未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大国地位没有应有的尊重。因此，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必须加强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国，要调整霸权心态和强权心态，切实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那样，将中国作为“平等伙伴”来对待。当然，对中国来说，也存在着如果对待美国的“利益关切”以及霸权心态问题。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也是被相当多国家认可而自己也追求之的霸权国，其“利益关切”肯定与普通大国是不同的，让其放弃霸权心态，真正做到对别国平等相待，肯定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却是中国必须理性面对、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所在。